

大學生在效益論和正義思維兩難情境中 客觀立場與置身其中的比較

陳煥文* 郭紀廷**

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檢視「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之心理計量特徵，瞭解台灣的大學生在該量表上之表現情形，並探討個人在不同情境下，處在不同的立場觀點所做的道德判斷之差異組型，以及探究重要的背景變項與效益和正義取向的關聯性。根據 230 位受試者的實徵資料發現，台灣的大學生在分量表 1 較傾向於效益論的取向，而在分量表 2 和 3 則較傾向於正義思維的判斷；15 題兩難情境中，有 13 題在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兩個不同觀點所做出的效益判斷得分的平均數和百分比有顯著差異。性別、教育水準、支持的黨派、宗教信仰以及工作經驗等是影響受試者的表現之重要背景變項。

關鍵字：效益論、正義思維、道德兩難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碩士

通訊作者：陳煥文，email: hchen@mail.nutn.edu.tw

壹、緒論

在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發生與道德相關的議題和紛爭，並且因而面臨到兩難情境，而兩難情境的背後，往往牽涉到不同道德思維原則間的衝突。道德的抉擇必須在相互對立衝突的不同權利、利益、主張和責任間作成決定。無論一個道德原則有多重要，它很可能在某些情境下會與其他重要的道德原則產生衝突。如果沒有相互對立衝突的道德原則存在於相關兩難情境背後，就沒有道德紛爭之問題的存在。

而道德兩難衝突情境的類別中，很重要的一對相互對立衝突的原則就是效益論和正義思維的衝突。在公共領域裡，決策者可能要面臨社會或機構組織中多數集體的(經濟)利益和尊重少數個人的基本權利間的對立衝突，以這幾年流行的新冠肺炎防疫為例，Omicron疫情相當嚴重時，每天數萬人染病，疫情中心是否要頒布三級警戒的措施，決策者內心要權衡的一方面是社會整體多數的經濟利益可能因此受到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要考量的是相對少數高齡老弱或慢性病患者，他們如果由於防疫沒三級警戒而讓疫情更加擴散會比較容易染病而得重症或死亡。

在公共領域中，當一個決策者面臨多數集體的利益和少數個人的重要基本權利(例如言論表達和宗教信仰自由)產生衝突時，會做出何種道德決策判斷，進而展現其道德思維的風格乃是一個重要的有關效益和正義思維兩難情境之研究議題。上個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組織機構的第一美德 (Colby & Kohlberg, 1987)，在正義論一書中提出了以無知之幕為基礎而推論得出最重要的第一個正義的原則就是尊重少數個人的基本自由權以避免受到社會組織機構裡多數群體在政治、宗教上的迫害 (Rawls, 1999, 2005)。而最重要的保護少數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包括言論表達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或投票權利)等 (Rawls, 1999, 2005; Waldron, 1995)。從上述角度來看多數群體經濟利益和少數個人基本自由權的對立是效益與正義思維衝突的特別重要之例子。組織機構(例如工作場所)的決策者可能會在促進組織的多數集體經濟利益和捍衛少數個人成員的言論或宗教自由之間面臨兩難選擇 (Barry, 2007; Vickers, 2002, 2008)。

而在何種性質或類別的多數集體利益和少數個人的基本權利衝突下，決策者較易做出效益論的判斷？反之，在哪種類別性質的多數群體利益和少數個人基本權利的對立下，決策者較易做出正義思維的判斷？這些是亟待探究的重要議題。另外，當我們面臨決策時所處的位置觀點不同，所考慮的面向也就全然不同，因此在面臨效益論和正義思維的衝突兩難情境時，決策者所做的道德判斷是否會因其所身處的位置、觀點或立場的不同(例如從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的不同立場和觀點)因而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斷？上述這些研究議題是重要而且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去探討的。

一、效益論與正義思維

（一）效益論的內涵特性

效益論最簡單的陳述方式是：能為社會最大多數帶來最大幸福的行為或政策，在道德上就是正當的（Kymlicka, 1991）。效益論是由Bentham所提出的，他的主要觀點是道德的最高原則就是幸福的最大化，也就是追求快樂扣除痛苦的最大總和。凡是能把效益最大化的，就是正確之舉（引自Sandel, 2009, p.34）。而所謂的「效益」（utility）是指一切能添樂減苦的事物（Sandel, 2009）。

人都喜歡快樂與幸福的事，討厭痛苦與避免傷害。效益論認為這是不可違反的事實，也是人們生活的基本需求，效益的最大化不只是道德的原則，更是社會立法的標準，政府在訂定法規時，應該盡量為整體多數人民帶來最大福祉與效益。

效益論指出，道德的最高原則是使幸福(快樂)最大化，效益論也強調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一個行為的道德地位取決於所帶來幸福(福祉)的程度，這也決定了結果的好壞（Sandel, 2009）。正確的事情就是能使效益最大化。效益意味著任何產生利益、快樂或幸福的事，以及任何防止成本、痛苦或苦難的事。在經濟或公共政策制定中廣泛使用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效益論思想的影響。效益論堅持認為，結果的效益、好壞是唯一具有內在意義的道德相關因素。效益論強調主張能夠導致整體多數最大利益的行為。這意味著效益論只關注行為的效果。

效益論似乎是非常符合每個人需求的道德理論，不過按照效益論的邏輯繼續推演下去，每個公共議題都依效益最大化的結果來決策，最後必定會產生個人或少數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的不幸。也就是說，效益論認為的使效益最大化就是盡量滿足大多數人的福祉與福利，但是如果個人或少數人的福祉、基本權利與效益最大化的多數人利益互相衝突時，這些個人或少數人就將得不到保護，甚至連基本權利也會被犧牲。但效益論並不考慮這些，它認為只要能增進最大化的效益就是正當的行為（Kymlicka, 1991; Smart & Williams, 1973）。

效益論只關注增樂減苦的最大總和，也就是效益最大化，卻忽略了尊重個人的基本權利。效益論看重個人權利的方式是將人的每個福祉都計算在內，但是這一點，意謂著效益論的邏輯繼續推演下去，可能會允許某些違反常規、規範甚至損人尊嚴的待人方式（Sandel, 2009）。

（二）正義思維的內涵特性

正義思維理論的觀點認為，個人的基本權利是普世的價值，所有人都應該平等地受到對待，每個人的福祉與權利都應該受到尊重，不論集體多數的效益再怎麼龐大，都不應該有任何個人被當作效益最大化的犧牲品，更極端的說，個人的基本權

利是至高無上的價值，每個人都平等地擁有這項權利，無論什麼原因都不可作為剝奪他人權利的理由。

康德的義務論提出，任何特定行為的正確性或錯誤性都不是由其後果的好壞決定的。某些對待人的方式，例如殺害無辜者、施以酷刑，造成傷害和作弊是不正當的，即使以這種方式行事將使利益最大化。多數人的利益不能以侵犯個人權利為代價獲得，也就是說，不能以犧牲個人基本權利、自主作為代價來達到群體的利益。康德的理論強調以人為本的價值，並尊重個人自主權和人格尊嚴。人是理性的人，具有絕對的內在價值。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人之權利以及二十一世紀初提出的普遍人權都受到義務論（尤其是康德主張）思想的強烈影響（Sandel, 2009）。康德義務論強調(個人)權利是優先於多數(群體)的利益。限制作出傷害行為的道德要求應優先於效用的最大化。它們具有自身內在本質的價值，獨立於行為結果的好壞或所帶來的利益。

John Rawls (1921~2002年) 是一位美國政治哲學家，也是道德倫理學家，他在著作的正義論一書中主張，假設大家聚集起來，在「無知之幕」之後做選擇，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職業、種族、膚色、性別、宗教信仰、學歷等，這些條件一無所知，就等於是在平等的初始狀況下做選擇，既然沒有人因為自然或社會的偶然機會而處於優勢或不利的地位，這樣協商的原則就會符合正義（Sandel, 2009）。

羅爾斯假設每個人皆處於「無知之幕」之後，並且無法得知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職業或學歷等，也不知道自己在財富和能力的分配情形。這樣假設的主要目的在於，遮蔽人們在身份與能力的事實和社會環境，以及造成人們階級不平等的各種因素，希望使人們能夠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來思考與評估問題並作出選擇，藉此進一步地達成正義分配的原則（Kymlicka, 1991）。

在無知之幕下(即上述假設情景下)，每個人將試著同理他們可能身處的每個可能的位置。由於每個人都了解自己在社會上的確切位置，因此，最糟糕的情況將被認真地對待重視(例如淪為少數的政治、宗教信仰者而為佔多數人的政治、宗教群體所壓迫)。各方達成並接受的正義原則將保證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取得的最好之結果。因此(在無知之幕下)產生的第一條正義原則與消極權利有關，它說某些自由權是基本重要的，應提供給所有人，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等。保護個人基本權利或自由是民主政府的最高優先事項。它們是從假設的無知之幕(即上述假設情景下)得出的抽象社會契約的結果。康德和羅爾斯的倫理學強調避免損害或侵犯基本權利，包括自由權利和個人自主。

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推得的第一個正義原則強調在任何組織機構中基本自由權的保護，而重要的基本自由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投票權利等（Rawls, 1999, 2005; Waldron, 1995）。個人的基本自由權不能因為社會上多數人的群體經濟利益之增進而犧牲或限制（Rawls, 1999, 2005），個人的基本自由權有可能因為社會

上多數人為了群體經濟利益之增進而受到限制，例如多數人(majority)有可能因集體的經濟利益而限制較弱勢的少數個人或少數群體的政治及宗教自由權。

正如羅爾斯(John Rawls, 1999, 2005)所說，正義是社會機構或制度的第一美德，正義的主要對象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包括各種社會組織機構，如公司等工作場所、學校、教堂等。達爾(Dahl, 1989)也強調了民主公司或企業等機構中自主和自由對從事工作的人們日常生活福祉的重要性。

在現代民主社會，而不是在威權政權的時代，言論和宗教自由這兩項基本權利可能會受到各級機構或組織(如工作場所)的侵犯。組織機構(例如工作場所)的決策者可能會在促進組織的多數集體經濟利益和捍衛少數個人成員的言論(或宗教)自由之間面臨兩難選擇(Barry, 2007; Vickers, 2002, 2008)。這也是效益思維與康德或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在組織機構中可能產生衝突的情境之具體例子。

(三)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內涵

在文化心理學的傳統中，用於解釋跨不同文化的社會行為中的跨文化變異的最重要構念之一是個人主義/集體主義(Kagitcibasi, 1997)。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有關的主要方面有兩個面向，即關係性和規範性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關係性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是關係的自我取向。這種自我-他人關係取向為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提供了重要的人際框架。而關係性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可分為獨立(或分離)的自我和相互依賴(或關係)的自我。與本研究較有關的是規範性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以下作簡略的描述。

規範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社會價值、規範、制度和傳統相關。此外，特里安迪斯(Triandis)認為集體主義是個人的計畫對集體的目標之服從，並指出，將集體目標服從個人目標是個人主義的最突出特徵(Kagitcibasi, 1997)。在規範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向度上，區分了垂直類型和水平類型兩個類型。規範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向度的垂直和水平類型分別代表社會地位(或階級排序)的不平等和平等。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規範價值方面，都與人類組織中的傳統、保守主義、等級制度、權威等級和權力距離的概念有關。與這些概念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了團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從這個角度來講文化心理學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對立與哲學上的效益論(多數群體的利益)和康德羅爾斯正義論(個人基本權利和自主之保護)的對立是相通、相對應的。

(四) 效益論與正義思維之測量議題之省思

效益論與正義理論在許多公共議題情境下其實是互不衝突的，但是當一個公共領域之道德議題牽涉大多數人的福祉或利益，並與個人或少數人的基本權利互相產生衝突無法顧及周全時，就會形成效益論與正義理論兩難衝突的困境。受試者面對這兩種道德思維衝突的困境時，會如何做決策與判斷呢？效益論與正義思維

兩難情境的測驗就是希望瞭解當受試者面臨兩難情境時，是如何解決效益與正義這兩種道德觀的衝突。

多數情形下，影響之群體效益或利益較小時，人們傾向保護個人或少數人基本權利的正義原則，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當群體效益或利益大到一定程度時，例如：為了避免災難性的後果，人們是否仍然遵循正義原則，是值得研究探討的，而深入了解效益或利益應該需要有多大影響力，才會迫使受試者打破不得侵犯基本權利的正義道德限制或閾限，轉而選擇傾向維護群體多數的效益或利益，也是筆者發展兩難測驗的主要目的之一。

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其實就像各自在天秤兩端上的法碼。當受試者面對兩難困境時，等於在天秤的兩端做抉擇，衡量哪一端對受試者來說相對份量較重，也就是受試者會思考效益論或正義思維各自所影響的後果，接著去選擇其中相對較為重要的一方。

當公共道德議題牽涉到人的生命權時，大部分的受試者都會傾向保護人的生命，因為對多數人而言，生命是至高無價的，也是合情合理的結果。但是當議題牽涉生命權以外的基本權利時，例如：言論表達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之權利等，此時這些權利相對於生命來說就顯得較不嚴重或急迫，在這情況下，受試者就可能會陷入兩難，去思考並比較天秤的兩端何者相對較為重要，最後做出一個抉擇與判斷。所以每個受試者心中都有一把用來評估道德的量尺，且尺度都不盡相同，而此研究的目的正是要藉由兩難情境測驗，了解受試者的道德尺度與道德價值觀取向之現況。

（五）相關背景變項

Kohlberg的道德心理學傳統的後俗規的道德思維正是體現了即使與多數群體訂定的規則或律法有衝突，個人的基本權利還是受到維護和尊重，Kohlberg後俗規的第六階段道德思維即是體現羅爾斯的第一正義原則(Kohlberg, 1981)，因此強調保護少數個人的自由權不要受到多數效益利益的計算而犧牲。從道德心理學的重要相關研究顯示教育水準、政治態度、道德教育的經驗年齡、宗教信念和政治態度等變項和Rest的DIT測驗之P分數有顯著的相關(Rest et al., 1999; Rest, et al., 2000)。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由於先前道德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仍存在著許多待改善的空間，如：價值判斷大多侷限在較為極端的生命權，以及題目情境太過虛擬不切實際，而使得受試者難以深入其境、體會等。因此，本研究採用「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乃針對上述要點加以改善，以較廣泛的基本權利為範圍，並使用日常生活脈絡為情境之依據，許多情境都是實際的案例 (Barry, 2007; Vickers, 2002, 2008)，在量表

中的試題皆以效益論與正義思維的兩難衝突情境，使受試者在道德困境中思考並做出選擇與決策。研究對象以台灣大學生為主，藉以了解台灣大學生的道德思維風格取向之現況，以及從不同立場、觀點所做道德判斷的差異組型，並探討受試者的不同背景變項與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的作答表現之關係。

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符合真實日常生活脈絡情境的「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來探討該量表的心理計量特徵和瞭解台灣大學生在不同兩難情境的道德思維判斷取向與現況，以及探究從不同觀點、角度所做兩難情境判斷之差異組型特徵，並研究不同的重要背景變項與效益和正義取向之關聯性。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摘要如下。

（一） 研究目的

1. 探討「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之心理計量特徵。
2. 瞭解大學生的效益論與正義道德思維之現況。
3. 探討受試者是否置身情境之中，所做的道德判斷及其反應組型之差異。
4. 探討重要背景變項與效益論與正義道德思維之關聯性。

（二） 研究問題

1. 「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之信、效度為何？
2. 受試者在「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上的表現之現況為何？
3. 受試者從客觀立場或置身其中的觀點所做的道德判斷及其反應組型之差異為何？
4. 不同背景的受試者在效益論與正義道德思維上的差異為何？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以適合現代生活情境使用的「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來探討該量表的心理計量特徵及瞭解臺灣大學生道德思維風格之現況，以及探討從不同觀點所做效益與正義兩難情境判斷的異同，並探究不同的重要背景變項與正義及效益論之道德思維風格間的關聯性。研究方法部分區分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分析三個部分來加以描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了解台灣地區的大學生之道德思維風格，預試的施測人數為67人，經

過篩選留下的有效樣本為51份，正式施測的有效樣本則為230人。由於人力、時間與費用限制的考量，本研究乃採便利抽樣，而研究的樣本主要由在臺南地區和部分外縣市的大學生所組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分析臺灣大學生之道德思維風格，採用筆者所發展的「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作為蒐集資料的工具，量表的內容是以文獻所探討的道德理論為架構，並針對過去學者所用的道德量表之缺陷（主要是問題情境大多侷限於生命權）修改強化，多數題目是以較為貼近真實生活的實際案例來加以改編以作為每一個題目的情境（Barry, 2007; Vickers, 2002, 2008），以李克特氏四點量表將作答反應分為四個等級，選項依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的型式，讓受試者選答。本研究的正義道德取向定義為個體在面臨集體多數的利益和少數個人基本權利產生衝突的兩難情境時，做出了保護少數個人基本權利(和自主)的道德判斷。本研究的效益論取向定義為個體在面臨集體多數的利益和少數個人基本權利產生衝突的兩難情境時，做出了維護集體多數的利益之道德判斷(請見表1)。受試者只需在閱讀完題目後，以第一時間的反應判斷來作答即可，並沒有對與錯的問題，得分越高代表越傾向效益論，得分越低代表越傾向正義思維的判斷。

表1

正義與效益論道德取向的操作型定義

構面	操作型定義
正義道德取向	參考前述有關康德和羅爾斯的正義思維理論，本研究的正義道德取向定義為個體在面臨集體多數的利益和少數個人基本權利產生衝突的兩難情境時，做出了保護少數個人基本權利的道德判斷。
效益論取向	本研究的效益論取向定義為個體在面臨集體多數的利益和少數個人基本權利產生衝突的兩難情境時，做出了維護集體多數的利益之道德判斷。

量表原來包含18個題目，每個題目各有2~4個小題，經預試之後，保留其中15題作為正式的量表。每一個題目均包含2~4個小題，各題的第一小題均為「客觀立場」之題型，意指受試者是以旁觀者立場面臨該題情境時的當下反應而做出判斷。另外，第1、2、4、6、7、9、10、11、12、13、14、15題的第二小題，以及其餘的第3、5、8題的第三小題均為「置身其中」之題型，意指受試者是以該題情境之決策者的立場作答。量表題目的範例，請見表2。

表2

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的試題範例

4. 近年恐怖活動日趨猖獗，歐洲 F 國國安局為了防範國際恐怖活動，而對居住在恐怖組織活躍的其他國家之他國公民實施廣泛網路監視，希望過濾出與恐怖組織活動有關的電子郵件、聊天紀錄等網路聯繫，以期確保國家公共及飛航安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請問您同意F 國政府的網路監聽他國公民的行為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請想像若您身處F 國國安官員的位置，負責反恐行動，您會同意為了防恐而實施網路監聽他國公民的措施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請想像若您身為F 國公民，您會同意政府為了防恐而實施對他國公民網路監聽的措施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8. 華恩是休斯頓一家公司的主管，愛德華是該公司的員工，業餘興趣就是宣揚政治理念並計畫競選市民代表，但市政府強力支持的候選人恰巧和愛德華在同一選區，而市政府又是公司最大客戶之一，因此華恩要求愛德華為了公司整體利益考量，最好不要參選。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請問您認為愛德華需要退出參選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請問您認為愛德華應可依其理念繼續參選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請想像若您身處主管(華恩)的位置，面臨上述情境，您亦會做出與華恩相同的決定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4)請想像若您身處愛德華的位置，面臨上述情境，您會退出參選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研究問題，提出相應的分析方法，並以SPSS軟體完成所有的資料分析工作。

(一) 以Cronbach的 α 係數作為量表分數信度估計的方法，並以探索性因素分析來提供量表的效度證據，以回答研究問題一。

(二) 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包含平均數、標準差，針對受試者在量表的表現之現況做敘述，以回答研究問題二。

(三) 進行相依樣本T考驗，探討受試者在相同情境但處於不同立場或觀點下，所表現的差異情形，以回答研究問題三。

(四)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受試者因不同的背景變項而在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上的表現有無差異，以回答研究問題四。

參、結果與討論

本節依據對正式施測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的結果，來回答相關的研究問題，第一小節針對量表工具的心理計量特徵進行描述，包含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的結果；第二小節則對資料蒐集結果進行初步統計分析，描述大學生在「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上的表現現況，以及詳述從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兩個不同觀點角度所做道德判斷之差異組型；第三小節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在量表上的答題反應是否存在差異。

本研究題型分為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兩種題型，讓受試者從不同的角度及立場來對多數集體效益和少數人基本權利衝突時做出決策與判斷，但因為置身在領導者位置做決策，更能使受試者們在面臨該情境下，表現更貼近現實的反應情形，因此本研究以置身其中的問題為大學生在此量表上的主要表現，而計分方式以每個情境中的「置身其中」題為主，在單一試題量尺上，從1到4分，得分在2分以下則較屬於正義思維的判斷；而在3分以上則較屬於效益論的判斷，整個量表平均得分會介於15至60分之間。

一、量表的心理計量特徵探討

(一) 因素分析

有關置身其中的15個題目之因素分析部分描述如下，因為KMO取樣適切性檢定為.77，球形檢定卡方值為622.78， $p < .001$ ，因此利用正式研究的樣本230人在正式的15題量表上的作答反應資料來進行因素分析。採用主軸因素法來抽取因素，並以平行分析的方法和以特徵值大於1的標準來決定留取的因素數目（涂金堂，2016），兩種方法所得到的因素數目皆為三個因素，經斜交轉軸後，所得到的因素負荷量呈現在表3之中。這三個因素中的第一個因素命名為「言論自由」，第二個因素命名為「一般效益」，第三個因素命名為「宗教自由」。第一個因素與第二個因素之間的相關為.21，第一個因素與第三個因素之間的相關為.28，第二個因素與第三個因素之間的相關為.00，顯示各個因素之間的相關不是特別的大。

客觀立場的題目因素分析的結果(如表4)，與置身其中題目因素分析的結果之組型是非常相似的，以平行分析法和特徵值大於1的方法皆得到三個因素(言論自由、一般效益、宗教自由)，除了第8題這題從在置身其中時為歸屬於言論自由，到客觀立場時則改歸屬一般效益，其餘各題的因素歸屬在兩種不同立場觀點皆相同。第8題情境為有一家公司的員工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並計劃競選市民代表但是市政

府支持的候選人恰巧和這名員工在同一選區，且市政府又是公司最大客戶，因此公司主管要求這名員工為了公司整體利益考量最好不要參選，若從整體機構多數(員工)的利益之維護和少數(員工)個人基本權利的保護間的衝突來講，可把第8題解讀為一般效益的題型，而若從題目有強調員工個人之自由參選權的內容特徵而言，則可把第8題解讀為歸屬言論表達自由的範疇。

表3

置身其中題目因素分析之樣式係數與結構係數

	Factor		
	言論自由	一般效益	宗教自由
第14題-貧困福利	.70 (.68)	-.04 (.11)	-.03 (.16)
第15題-郵局檢舉	.69 (.72)	.06 (.21)	.04 (.23)
第13題-報社獎勵	.69 (.64)	-.11 (.04)	-.09 (.10)
第11題-教育研究	.59 (.61)	-.03 (.10)	.08 (.24)
第10題-學校揭發	.55 (.57)	-.06 (.06)	.09 (.25)
第2題-伊達利參選	.44 (.45)	.08 (.17)	-.02 (.10)
第8題-愛德華競選	.39 (.44)	.21 (.29)	.02 (.13)
第9題-石油軍事	-.05 (.10)	.71 (.70)	.01 (-.01)
第4題-恐怖活動	.09 (.21)	.54 (.56)	.04 (.06)
第1題-牛乳飼料	-.08 (.01)	.42 (.40)	.02 (.00)
第6題-鄰國對立	.00 (.04)	.39 (.39)	-.14 (-.14)
第7題-種族衝突	.13 (.23)	.39 (.42)	.09 (.12)
第5題-天主教墮胎	-.06 (.13)	.01 (-.01)	.66 (.64)
第3題-基督徒禮拜	.04 (.21)	-.02 (-.02)	.62 (.63)
第12題-回教面紗上課	.03 (.15)	.01 (.02)	.44 (.44)

表4

客觀立場題目因素分析之樣式係數與結構係數

	Factor		
	言論自由	一般效益	宗教自由
第14題-貧困福利	.75 (.69)	-.07 (.16)	-.09 (.12)
第13題-報社獎勵	.64 (.65)	.08 (.29)	-.07 (.13)
第15題-郵局檢舉	.62 (.62)	-.05 (.16)	.05 (.23)
第11題-教育研究	.60 (.64)	.01 (.22)	.13 (.31)
第10題-學校揭發	.58 (.61)	.02 (.22)	.09 (.26)
第2題-伊達利參選	.51 (.53)	.06 (.23)	-.01 (.15)
第9題-石油軍事	.05 (.25)	.69 (.69)	-.07 (.02)

表4

客觀立場題目因素分析之樣式係數與結構係數(續)

	Factor		
	言論自由	一般效益	宗教自由
第6題-鄰國對立	.02 (.13)	.48 (.47)	-.16 (-.10)
第4題-恐怖活動	-.03 (.15)	.42 (.42)	.14 (.18)
第8題-愛德華競選	.07 (.21)	.39 (.41)	.04 (.10)
第7題-種族衝突	.12 (.26)	.35 (.40)	.08 (.16)
第1題-牛乳飼料	-.06 (.05)	.34 (.32)	.00 (.02)
第5題-天主教墮胎	.02 (.22)	.07 (.14)	.59 (.60)
第12題-回教面紗	.11 (.29)	.07 (.16)	.51 (.55)
第3題-基督徒禮拜	-.02 (.09)	-.07 (-.03)	.46 (.44)

(二) 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Cronbach's α 作為測驗分數信度的估計方法，置身其中的觀點之全測驗以及三個分量表得分之 α 係數分別為.72、.78、.61和.59。雖然分量表二和分量表三的信度較低，但主要是因為題數較少的緣故，因此應是在可接受範圍；而分量表一與總量表的 α 係數皆達.70，呈現良好的信度指標；至於客觀立場時的全測驗以及三個分量表得分的 α 係數的組型和置身其中的題目是非常相似的，信度分別為.74、.78、.60和.54。由於分量表一是測「言論自由」，分量表二是測「一般效益」，分量表三是測「宗教自由」，三者屬性內涵有實質差異，所以影響到題目間同質性的程度，因而稍微拉低了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因此造成總量表的信度反而低於分量表一(言論自由)的信度之現象。第3個分量表(宗教自由)在置身其中和客觀立場時之信度皆略低於.6，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題數只有三題，因而造成信度低於.6；另外，雖然總量表的信度在.7以上，但由於總量表的信度略低於分量表一，表示各分量表的内容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差異或異質性，因此代表在使用時，分量表可能較不適宜合併為一個單一總量表來使用。

二、量表上的表現現況

(一) 分量表的表現概況

「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分成三個分量表，各分量表的題數分別為7題、5題與3題，以四點計分來說，各分量表總分的範圍分別是7至28分、5至20分以及3至12分，各分量表可能得分範圍的平均中間值為17.5、12.5以及7.5分，將各分量表總分平均分數除以各分量表的題數，可將分數轉換為各分量表的每題平均分數。各分量表之總分平均數和個題之平均分數呈現在表5之中，由表中的分量表總分之平均數來看，可以了解受試者在各分量表的效益論和正義

思維的傾向，分量表1之總分平均數為18.26，超過平均中間值的17.5分，各題平均分數為2.61，超過平均中間值的2.5分，表示受試者在分量表1的作答，大多傾向於效益論的思維判斷；分量表2與分量表3之總分平均數分別為11.72和6.73，兩者皆低於平均中間值得分的12.5和7.5分，各題平均分數為2.34及2.24，皆低於平均中間值2.5分，表示受試者在分量表2與分量表3上的作答反應，大部分傾向於正義思維的判斷。

表5

分量表總分及分量表各題分數之情形

	題數	分量表總分之平均分數	分量表各題之平均分數
言論自由	7	18.26 (17.5)	2.61
一般效益	5	11.72 (12.5)	2.34
宗教自由	3	6.73 (7.5)	2.24

註：()中的數字為各個分量表可能得分範圍之平均中間值

(二) 不同立場觀點之判斷思維的表現差異

在討論相關的結果之前，必須先說明一下筆者在此研究的立場，在本研究中筆者的立場並不像Kohlberg (1981) 一樣將效益論和正義思維排成有高低優劣之區分，本研究的立場是比較趨近Fiske (1991)、Haidt (2012)或Rest的看法，把效益思維和正義思維視為同等重要的不同類型之道德思維原則而且並沒有高低優劣的區分。

表6顯示除了第5和第12題在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的立場沒顯著差異外，其他各題在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立場分別做出的效益判斷人數百分比及平均數之差異皆達顯著水準，茲就各題之情境及在客觀和置身其中立場所做判斷之差異描述如下。第4題的情境是F國為了防止恐怖組織的活動而對恐怖組織活躍的其他國家之他國公民實施網路監視，題目問受試者是否贊同F國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而侵犯他國公民的隱私權，當從客觀立場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時(平均數1.94)，只有21%的受試者贊成F國的行為而做出效益的判斷，換言之，有79%受試認為應該保護他國公民之隱私權而做出正義思維(保護個人權利)的判斷，但從置身其中的立場觀點(平均數2.54)，即當受試者從F國國安官員的位置來思考回答此問題時，則變成有58%的受試者做出效益的判斷，只有42%的受試做出正義思維的保護個人權利的判斷，在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立場做出效益判斷的人數百分比差異達37%(平均數差異.60, $p < .001$)，可能的原因是當從客觀立場來看待這個問題時，受試者如同從客觀第三人的角度來看一則新聞報導，由於自身完全超脫該题目的情境，因此較容易從保護個人的隱私權之方向來思考這個問題，而當從置身其中(處於F國官員)的角度觀點來回答此題目情境時，會從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的角度來思考，因而有58%的受試者較傾向做出效益的判斷。

第8題的情境為有一家公司的員工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並計劃競選市民代表，但是政府支持的候選人恰巧和這名員工在同一選區，且市政府又是公司最大客戶，因此公司主管要求這名員工為了公司整體利益考量最好不要參選，受試從客觀立場回答此效益與正義兩難情境時(平均數2.11)，只有22%為了公司集體經濟利益做出效益的判斷，有78%受試做出尊重個別員工的政治自由參政權利之正義思維判斷，而從置身其中觀點回答此問題時(平均數2.56)，即當受試者處在公司主管的位置時，則有56%的受試做出效益的判斷，但仍有44%的受試做出正義思維的判斷，在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立場做出效益判斷的人數百分比之差異達34%(平均數差異.45, $p < .001$)，可能的原因是在客觀立場時比較傾向保護個人的基本政治自由權利，但在置身其中的立場時，由於處在公司主管的位置會比較傾向考量公司整體的利益，因此有56%的受試者做出了效益的判斷。

第6題的情境為兩個相鄰的國家，A國為了反映民意而加入一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與B國敵對的國際組織，B國面臨國家安全利益受威脅下，打算用政治、經濟等制裁手段來阻止A國。受試者在客觀立場的回答(平均數2.39)有47%做出了為了國家安全利益而支持干預侵犯他國自主權的效益判斷，換言之，有53%的受試做出了應尊重A國的自主權之判斷，但在從置身其中的角度回答時(平均數2.78)，則有高達75%的受試者做出了效益判斷，從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角度所做效益判斷人數百分比的差異達28%(平均數差異.40, $p < .001$)，這可能是因為從客觀第三人角度看這題情境時，比較能從維護每個國家的自主自由權利方向來思考，而當受試處在受威脅的國家之官員或公民的角度來思考時，會傾向認為當自己的國家集體安全利益受到威脅時，即使會侵犯他國的自主權利也要阻止其發生，因而有75%的受試做出了效益的判斷。

第2題描述一家大公司的一位員工是社會黨員，他代表該黨參與市長競選，在電視辯論會中他主張建立工農政府及廢除私有財產制，他的主張完全與公司對私有企業制度的理念背道而馳，因而影響到公司的名聲和運作，當受試站在客觀立場(平均數2.42)看待這個情境時，有43%的受試做出了不容許該員工發表他的主張之基本自由權利，亦即為了公司整體的利益這43%的受試做出了效益的判斷，而當受試者站在公司主管的位置來思考這個情境時，則升到有62%的受試支持公司集體的利益而做出了效益的判斷，客觀和置身其中兩個角度所做出效益決定的百分比差異達到19%(平均數差異為.29, $p < .001$)。

第9題的情境為歐洲強國F國的主要油源命脈是來自進口西亞H國的石油，H國近來陷入內戰，對F國不友善的反抗軍逐一攻佔重要油田，F國為了確保國家經濟能源供應安全不受影響決定軍事介入干預H國局勢，但此舉預估會造成H國相當人數(上百人)的死傷，這題在客觀立場(平均數2.08)有26%受試做出效益的判斷，而當處在F國決策官員的位置時(平均數2.37)做出效益決定的百分比升到44%(但並未過

半)，代表縱使在置身其中仍有56%的受試是採取正義思維，但在兩個立場角度做出效益判斷的百分比差距仍達到18%(平均數差異.29, $p < .001$)。

第7題的情境描述中亞某國的一個城市發生了一起因種族衝突引起的殺人事件，兇手仍逍遙法外，民眾的不滿憤恨將累積成新的一波種族大暴動，整個社會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將非常嚴重，這個城市的首長最後決定將一位無辜的民眾當殺人犯予以終身監禁，以平息將發生的暴動，在客觀立場(平均數1.87)，只有20%受試支持效益的決定，而在置身其中的角度(平均數2.10)，有34%受試支持效益的決定，兩者的百分比仍有差14%(平均數差異.24, $p < .001$)，在這題不管在哪個立場，大部分受試多是採正義思維的原則，也就是不願意因集體多數的利益而犧牲一位無辜民眾的人生。

第13題的情境敘述有位在報社工作的記者在個人部落格貼文批評工作機構的工作環境及相關政策，因而影響報社的聲譽，在這個情境一方面要考量報社整體的名聲和利益，另一方面要考慮到這位記者個人的基本權利(言論表達自由)的保護。在客觀立場(平均數2.36)有36%的受試做出效益決定，如果是置身處在報社主管的觀點來思考(平均數2.56)，則有54%的受試做出效益的決定，兩者的百分比差異達18%(平均數差異.20, $p < .001$)也達顯著。

第14題的情境為一位在某公司機構工作的員工在一個公共論壇的網頁留言表示貧困者在心理、經濟未準備好時不能生育孩子，在政府未教育這些貧困者前，他不贊成加稅或提供福利預算，他在留言後面留下了標有公司名稱的email，因此受到一些社會人士不滿地留言並質疑公司對於弱勢群體的立場，這個情境一方面牽涉到公司整體的利益(公司名聲信譽的維護)，另一方面則涉及到這名員工在公共論壇發表意見的言論自由權。在客觀立場(平均數2.50)有48%的人做出效益的決定，而在置身其中的角度(平均數2.63)則有63%的受試是支持維護公司的名譽和利益而做出效益的決定，兩個觀點角度的百分比差異有12%，而平均數的差異(.14, $p < .001$)也達顯著。

第10題的情境為一位高中老師投書報紙批評學校沒依先前允諾將經費用於教學大樓的建設，反而將錢花在較次要的體育設施，學校則認為此事以公開信呈現已對學校整體的利益、名聲和信任造成長期傷害。在客觀立場(平均數2.37)有39%的受試者做出了支持維護學校整體利益和名聲的決定，而在置身其中的角度(平均數2.64)則有61%的受試者做出了支持學校的決定，而有39%的受試是支持這位高中老師就與學校有關的公共議題發表想法的言論自由權利，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的平均數差異(.27, $p < .001$)和百分比差異達到顯著。

第15題的情境為一位郵局員工在網路上批評郵差工作常超時，而郵局則認為該員工未依既有程序反應問題，已嚴重破壞郵局集體的聲譽。在客觀立場(平均數2.39)有42%的受試支持維護整體郵局機構的名聲利益，而有58%的人支持維護郵局

員工在網路發表他對機構批評的言論自由，而在置身其中的觀點(平均數2.59)，則有58%的受試做出了支持郵局的決定，兩個立場觀點的平均數差異(.20, $p < .001$)和百分比差異16%達到了顯著。

在所有試題中只有第5和12題在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的觀點之平均數和做出效益判斷的百分比沒有顯著差異，其情境描述如下。第5題的情境敘述一位篤信天主教的麻醉科醫生由於信仰的關係，因此反對墮胎行為，並因而要求醫院不要幫他安排婦科的墮胎手術，若醫院尊重這名醫生的請求，則在值班麻醉科醫師的輪班調度上需做調整，這亦會增加醫院的人事成本。這題在客觀情境(平均數2.29)有33%的受試是考量到醫院人事經濟成本將增加，而做出不答應這位醫生的請求的效益之決斷，另外有67%的受試是支持尊重這位醫生的宗教信仰主張，在置身其中(平均數2.27)則有32%受試做出效益的判斷，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的平均數差異(-.02, $p > .05$)和做出效益判斷之百分比的差異1%則沒達顯著。

第12題的情境裡有一位篤信回教的學校女助教，由於教規規範女性與男性相處時需戴面紗，因此這位助教請求學校准其在需要時佩戴面紗上課，並且盡量安排只支援女教師的課，然而助教佩戴面紗將影響所有學生在上課時對助教臉部表情的理解，而且學校在排課的行政效率考量上也不可能安排助教完全只支援女教師的課。這個情境一方面需考量的是尊重女教師個人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則需考量到學校教學和行政上的整體效益。在客觀情境(平均數2.06)只有16%的受試是支持學校教學行政上的集體效益，換言之，有83%的受試是支持女助教奉行她的宗教信仰教規，而在置身其中的角度(平均數2.10)，則有20%的受試認為學校的整體行政和教學之效益是較重要的，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的平均數差異(0.04, $p > .05$)和百分比差異(4%)並未達顯著。

表6

受試者在不同立場上在各題平均分數之差異檢定

	立場	平均數	<i>t</i>	差異檢定之顯著性
第1題-牛乳飼料	客觀立場	1.77	4.22	.000
	置身其中	1.93		
第2題-伊達利參選	客觀立場	2.42	6.45	.000
	置身其中	2.71		
第3題-基督徒禮拜	客觀立場	2.50	-3.03	.003
	置身其中	2.37		
第4題-恐怖活動	客觀立場	1.94	11.51	.000
	置身其中	2.54		

表6

受試者在不同立場上在各題平均分數之差異檢定(續)

	立場	平均數	<i>t</i>	差異檢定之顯著性
第5題-天主教墮胎	客觀立場	2.29	-.661	.509
	置身其中	2.27		
第6題-鄰國對立	客觀立場	2.39	8.32	.000
	置身其中	2.78		
第7題-種族衝突	客觀立場	1.87	6.05	.000
	置身其中	2.10		
第8題-愛德華競選	客觀立場	2.11	9.12	.000
	置身其中	2.56		
第9題-石油軍事	客觀立場	2.08	6.62	.000
	置身其中	2.37		
第10題-學校揭發	客觀立場	2.37	6.70	.000
	置身其中	2.64		
第11題-教育研究	客觀立場	2.42	4.38	.000
	置身其中	2.57		
第12題-回教面紗上課	客觀立場	2.06	1.34	.180
	置身其中	2.10		
第13題-報社獎勵	客觀立場	2.36	5.08	.000
	置身其中	2.56		
第14題-貧困福利	客觀立場	2.50	4.07	.000
	置身其中	2.63		
第15題-郵局檢舉	客觀立場	2.39	5.21	.000
	置身其中	2.59		

三、重要背景變項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受試群體的重要背景變項與分量表得分之間的關聯性。

(一) 分量表與重要背景變項的關聯性

本研究收集的背景變項相當多樣，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就讀學院、宗教信仰、道德相關課程、討論公共議題頻率、支持政黨、發表評論、工作經驗，將這些背景變項在三個分量表的得分以變異數分析來加以探討，以下描述與各分量表有顯著相關的背景變項(見表7至表11)。

在性別變項上，男生在一般效益的得分顯著高於女生，男生平均數12.27，標準差2.47，女生平均數11.40，標準差2.22， $F(1, 228) = 7.62$ ， $p = .006$ ，即 $p < .01$ ；而教育水準變項在一般效益和宗教自由分量表有達顯著， $F(2, 225) = 3.23$ ， $p = .042$ ； $F(2, 225) = 9.18$ ， $p < .001$ ，在一般效益量表的得分，學士、碩士、博士的平均分數分別為11.87、10.52、11.50，標準差分別為2.38、2.16、1.51，經由Scheffe事後比較得出學士顯著高於碩士(平均數差異1.35， $p = .044$ 即 $p < .05$)；而在宗教自由分量表的得分，學士、碩、博士的平均分數分別為6.58、7.38、8.10，標準差分別為1.34、1.16、1.37，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碩士和博士的得分皆顯著高於學士，平均數差異分別為.80、1.52， p 值分別為.032、.002，此結果一方面可能與許多研究所的受試(尤其是博士班學生)，很多都是擔任學校機構的主管，因此在回答宗教自由的三個情境時，比較是從主管的角度去考量到整體機構的利益。此結果亦呼應前面文獻所提道德思維判斷和教育程度有關聯。而支持不同黨派的受試在言論自由分量表的得分有達顯著差異， $F(3, 266) = 3.39$ ， $p = .019$ ，其中支持無黨派、國民黨、民進黨和其他小黨派的言論自由平均數分別為18.28、19.63、18.03、14.60，標準差分別為3.23、2.13、2.81、2.88，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支持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受試得分沒有顯著差異，平均數差異為1.59，Scheffe比較 p 值為.431，此外，支持無黨派和國民黨受試的得分皆顯著高於支持其他小黨派受試的得分，平均數差異分別為5.03、3.68， p 值為.010、.048，此結果也呼應前面提到Rest等人研究結果，即政治態度信念與道德思維是有關聯的。

宗教信仰的類別在宗教自由分量表得分有顯著差異，各類別包括無宗教信仰、基督教、佛教、道教及其他，平均數分別為6.83、5.80、6.44、6.96、6.40，標準差為1.32、1.15、1.47、1.29、1.90，Scheffe事後檢定顯示基督教的分數顯著低於無宗教信仰和道教這兩組，平均數差異分別為-1.03、-1.16， p 值分別為.043、.031，可能的原因包括三題宗教自由的題目中含蓋一題是有關一家公司的基督徒員工請求調開每星期日上午的排班，以參加教堂禮拜，如果公司答應請求，則需協調其他員工替補換班或需聘一位非全職人員在星期日上午協助輪班。有基督教信仰的受試在這題很可能會傾向支持員工的請求，而較不會支持為了公司的整體經營效率而犧牲基督徒員工的最重要信仰活動，此結果也呼應了前面文獻Rest等人的研究，即宗教信念與道德思維的關聯性。另外，有無工作經驗也是影響宗教自由分量表得分的變項， $F(2, 227) = 5.21$ ， $p = .006$ ，全職人員、兼職人員、無工作經驗三組的平均數分別為7.41、6.64、6.54，標準差為1.18、1.42、1.18，Scheffe比較顯示全職人員的得分顯著高於兼職人員與無工作經驗者，平均數差異分別為.78、.87， p 值分別為.011、.017，全職人員之所以得較高分數很可能是因為有較多的工作經驗，因此比較能體會從機構的角度來考量公司的集體經濟利益。

表7

不同性別在一般效益分量表的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F</i>	顯著性
一般效益	組間	40.91	1	40.91	7.62	.006
	組內	1223.29	228	5.37		
	全體	1264.19	229			

表8

教育水準在一般效益和宗教自由分量表的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F</i>	顯著性
一般效益	組間	35.11	2	17.56	3.22	.042
	組內	1225.57	225	5.45		
	全體	1260.68	227			
宗教自由	組間	32.15	2	16.08	9.18	.000
	組內	393.88	225	1.75		
	全體	426.04	227			

表9

不同黨派在言論自由分量表的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F</i>	顯著性
言論自由	組間	98.48	3	32.83	3.39	.019
	組內	2189.87	226	9.69		
	全體	2288.35	229			

表10

不同宗教在宗教自由分量表的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F</i>	顯著性
宗教自由	組間	20.13	4	5.03	2.77	.028
	組內	409.16	225	1.82		
	全體	429.29	229			

表11

有無工作經驗在宗教自由分量表的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i>F</i>	顯著性
宗教自由	組間	18.84	2	9.42	5.21	.006
	組內	410.45	227	1.81		
	全體	429.29	229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針對台灣的大學生進行實徵資料的分析，進而探討台灣大學生在此量表上的作答反應。本節首先呈現研究的結論，然後說明研究限制，並提出建議，並對研究過程有待改善之處加以說明與檢討，以提供後續研究修正的參考。

一、研究結論

(一) 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的因素分析、信度指標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工具為「效益論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量表」，並與相關專家討論進行修改，最後得到15題作為正式量表；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測驗內容分成三個分量表，分別為「言論自由」、「一般效益」以及「宗教自由」分量表。置身其中觀點的全量表及分量表得分之信度係數以 α 係數來進行估計，全量表及各個分量表的信度分別為.72、.78、.61和.59，分量表2和3的信度係數偏低，主要是因為題數較少的緣故。分量表1以及全量表的信度係數尚屬良好。

(二) 受試者在不同立場觀點的表現差異

受試者在面對效益與正義思維兩難情境時，會因為是站在完全客觀第三者抑或是置身其中的觀點而對兩難情境的道德判斷產生不同的影響。在本研究中15題兩難情境中，只有兩題在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兩個不同觀點所做出的效益判斷之平均數和百分比沒有顯著差異，其餘13題皆達顯著差異。而15題中有10題在客觀和置身其中兩個不同觀點所做出的效益判斷人數百分比的差異超過10%，最大差異是第8題，兩種觀點的百分比差異達34%，其情境的重點在個人是否需為了整個機構集體多數(員工)的經濟利益而犧牲個人政治理想的表達自由權，而兩種觀點的百分比差異最小的是第5題，其情境的要點為個人是否須為了整個機構醫院的集體多數(經濟)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宗教信仰。另外，在本研究15題的情境中，有6題在客觀立場和置身其中兩個不同觀點中都有超過半數50%的受試皆是做出正義思維的判斷。而有9題是在客觀立場的觀點時，有超過50%(過半數)的受試做出正義思維的判斷，而在置身其中的觀點時，則變成有超過半數(50%)的受試者做出了效益思維的判斷，在部分題目(這9題)會產生這樣的反應組型的可能原因為：在客觀立場的角度，個人沒有置身在情境中，完全是從旁觀第三者的客觀觀點來看兩難情境，因此比較能著重在個人基本權利的保護，而在置身其中的觀點，則是處在機構的主管決策者的位置來思考情境，考量的角度比較可能會聚焦在機構中多數集體的利益，包括經濟效益或攸關機構整體名聲利益之考量等。

本研究有關重要背景變項和一般效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三個分量表得分的關聯性顯示性別在一般效益、教育水準在一般效益和宗教自由、不同支持的黨派在言論自由、不同宗教在宗教自由以及有無工作經驗在宗教自由的得分有顯著差異，這也呼應連結前面文獻有關Rest等人的研究指出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政治信念與道德思維判斷有密切的關係。

這個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從置身其中的第一人稱(first-person perspective)的觀點(如：我應該...)做出的道德判斷會不同於從客觀立場第三人稱(third-person perspective)的觀點(如：他或她應該...)所做出的道德判斷。在跟自我有關的決策之認知歷程(例如：在這個情境我應該會怎麼做?)似乎是顯著的不同於在面對Kohlberg式的假設性之兩難情境所做決策之認知歷程。在本研究中，從置身其中觀點所做的效益道德判斷的得分，整體而言，傾向於比客觀立場觀點所做效益道德判斷得分來的高。從置身其中觀點(即第一人稱觀點，受試者想像他們自己置身為兩難情境中的主角)相對於從客觀立場觀點(即第三人稱觀點)，受試者似乎較易傾向做出自我服務以及較顧及自身利害傾向的判斷。受試者若置身於與其權益有利害關係的情境，亦即當受試者自己置身處於決策者位置時，就比較容易傾向從機構組織的集體利益之角度，甚或從身為決策當事人的自我或自身利害關係之利益考量角度，而做出較傾向效益的判斷。但上述的情況似乎仍有例外的情境，當情境中牽涉的個人基本權利為較重要者，例如攸關生命權的尊重與保護時，受試者無論是從客觀立場的第三人稱觀點或從置身其中的第一人稱觀點所做出的判斷，皆是較傾向於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正義思維判斷。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節為研究限制與建議，針對研究過程中有待改善之處說明與檢討，做為提供後續研究修正的參考方向。以下是為研究限制以及研究建議描述。

(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灣大學生在面臨效益論與正義思維的衝突情境之表現及探討相關影響因子，但受限於有限的人力、時間不夠充裕，以及問卷工具仍在發展改進中，所以還有許多應加強和深入研究的部份。

1. 樣本上的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方便取樣的方式收集，研究對象多半來自南部大學的學生，以及部分北部大學的學生，並未包括台灣其他各個縣市地區之大學生，因此在解釋及推論研究結果時，會受限於地區的限制，而對其它地區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與解釋；在學校類型的部份，也無法將國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之間的差異提供代表性的數量，加上受試者的人數未達預期。

2. 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在問卷量表方面，因為題目皆以情境方式命題，在考慮到題目因情境內容需求的關係，造成描述偏長與字數偏多，而增加受試者在作答上的閱讀負荷，因此將題目數量受限，無法納入更多元的因素之情境試題，所以在分析結果顯示只有三個因素，使得在解釋上有所限制。

(二) 研究建議

探討整體研究的結果，並提供檢討與建議，以做為後續進一步研究的參考依據。

1. 樣本取樣的建議

後續研究樣本盡可能取得全台灣北、中、南以及東部的代表性人數，並且在考量到多方面取樣人數的比例差異，亦可將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比例差異等方向納入考量，使得研究者在樣本的重要背景變項上獲取更有力及更多的解釋。

2. 研究與問卷方法的建議

本研究的架構建立在效益論與正義思維的基礎上，問卷的命題是採取情境式量表，在情境內容部份，是否完全排除其它可能的干擾因素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未來在問卷設計上，在情境的描述部份，應該考慮的更謹慎周全，或者增加追蹤試題，測量受試者是否在研究的架構上進行判斷。

再來是考慮到受試者在題目字數上的閱讀負荷，如何在減少題目數量與情境內容字數的同時，又能維持研究所需含蓋因素的題目量，這兩者間的取捨是研究者值得思考的。最後，因題目在數量上的限制，所以需透過與相關領域專家之討論及研究，如何更全面涵蓋試題情境的內容與可能因素，以滿足研究者在探討主題時的解釋。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涂金堂 (2016)。量表編製與SPSS。五南。

二、西文部分

Barry, B. (2007). *Speechless: The erosion of free expression in the American workplace*.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 Colby, A., & Kohlberg, L. (1987). *The measurement of moral judgm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validation*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iske, A. (1991).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Free Press.
- Haidt, J.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Penguin Group.
- Kagitcibasi, C. (1997).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J. Berry, M. Segall, & C. Kagitcibasi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p. 1-49). Allyn & Bacon.
- Kohlberg, L. (1981).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 Harper.
- Kymlicka, W. (1991).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 (2005).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st, J. R., Narvaez, D., Bebeau, M. J., & Thoma, S. J. (1999). *Postconventional moral thinking: A neo-Kohlbergian approac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Rest, J. R., Narvaez, D., Thoma, S. J., & Bebeau, M. J. (2000). A neo-Kohlbergian approach to morality research.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9(4), 381-395. <https://doi.org/10.1080/713679390>
- Sandel, M. J. (2009).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Penguin Group.
- Smart, J. C., & Williams, B. (1973).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ickers, L. (2002). *Freedom of speech and employ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ickers, L. (2008). *Religious freedom,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and the workplace*. Hart Publishing.
- Waldron, J. (1995). Rights. In R. Goodin, P. Pettit, & T. Pogge (Eds.),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pp. 575-585). Wiley-Blackwell.

投稿日期：2022 年 03 月 31 日
修正日期：2022 年 07 月 19 日
接受日期：2022 年 09 月 16 日

Comparison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 Reasoning Regarding Utilitarianism Versus Justice Dilemmas from Objective and Situated Standpoints

Huan-Wen Chen* Chi-Ting Kuo**

ABSTRACT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a utilitarianism versus justice scale and assessed the moral reasoning of students faced with utilitarianism versus justice dilemmas based on daily life scenarios. The consistency of their moral judgments made from objective and situated standpoints was also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background variables on their utilitarianism versus justice scale scores was explored. Empirical data from 230 participants revealed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more utilitarianism oriented on the first subscale and more justice oriented on the second and third subscales. Among the 15 items, 13 item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with respect to the means and proportions of the moral judgment scores the students assigned from objective and situated standpoints. Sex, education level, partisan orientation, religious beliefs, and working exper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utilitarianism versus justice scale scores.

Keywords: Utilitarianism, Justice, Moral Dilemmas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Maste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